

# 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七十周年

## 见证影视文学的全面发展

——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诞生记

□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2008年6月,我兼任《中国作家》主编。到任伊始,时任副主编萧立军对我说:艾克,咱们刊物其实应该再办一个影视版。这话我听进去了,也记在心里。我当时对他说,先不要急于做此事,等我熟悉了情况,明年可以先做一期增刊试一试,如果可行,从2010年开始做影视版也来得及。

《中国作家》由冯牧同志1985年创办时的双月刊,到2000年改为月刊,再到2006年增为半月刊,上半月文学版,下半月纪实版,已经是当时国内容量最大的文学刊物了。我刚接任主编,总得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熟悉的过程,之后再根据读者需求、社会和市场两个效益做决策才是。

2009年1月,我提出了“用最优美的中文,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,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”的办刊理念。我认为,《中国作家》作为国字头的文学刊物,就应该有与之相应的责任与担当,为繁荣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应有贡献。

2009年适值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,我们的心思就用在如何迎接这一大喜日子。我认为,文学不能简单的为政治服务,但是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,这是文学神圣的责任与担当。2009年2月7日,电影编剧王兴东发来短信:“艾委员,我是王兴东,上次我们谈到贵刊发电影剧本的事,我编的《建国大业》已开机了,这个剧本已有贾庆林两次批示,作为六十年重点作品,因此,很想《中国作家》发表,你意如何,请指示。”春节前,在人民大会堂的迎春茶话会上,我与王兴东坐在一起时曾谈起过刊物是否应该发表影视剧本事宜。

当时王兴东很赞成,他说现在影视剧本很多,除了拍摄后与观众见面,文学脚本基本没有出路。如果真做起来了,会有几点好处:一是影视脚本与读者见面,对读者和观众市场是一个互

动互补;二是对一些剧本写作者、初学者、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借鉴的园地和范本;三是有一些好本子由于找不到拍摄资金没有出路,而对持资拍摄者又没有好本子的一方,又提供了参考;四是对作者著作权是一个保护,以后无论谁剽窃或模仿,原发刊物就可以成为物证;五是刊物也将自然获得剧本的版权,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环境,维护著作权、版权都有好处;六是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。

那次我们谈得很投机,之后接到他的短信,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信号,也与我和萧立军当初的商定契合。

于是,我让萧立军着手操作这个增刊。中国作协老领导金炳华同志得知我的这一思路以后,也给了我一个剧本以示支持。这期刊物最终刊发了《建国大业》《穿越》等电影剧本。随之,这两个剧本均拍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影片,尤其《建国大业》,更成为了献礼大片,引领票房价值潮流,令人欣慰、令人鼓舞,令人慨叹,也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政协创立6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。

2010年7月,《中国作家》变为旬刊,即:上旬《中国作家·文学》,中旬《中国作家·纪实》,下旬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。三管齐下,推进《中国作家》全面发展。

2010年9月27日,在中国作协餐厅见到李冰书记,他对我说,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应该把明年影视作家深入生活的事抓起来。过了国庆,李冰书记要求把影视版办好,明年(2011年)期都要有重头稿,除了中宣部抓的重大题材,还要有原创未曾摄制的新剧本,此外还应该发一些话剧剧本。我向他汇报,已抓到王兴东的电影剧本《辛亥百年》和柳建伟、刘宏伟的电影剧本《飞天》。由此,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开始形成影响力,而且是全国唯一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和电视文学剧本的刊物,后来又增



加了微电影剧本等栏目。

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(2009-2012年)结果公布,是对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的一次集中检验。由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刊发的剧本有5部获奖:《建国大业》(王兴东、陈宝光)、《飞天》(柳建伟、刘宏伟等)、《信义兄弟》(丁兰策划)、《辛亥革命》(王兴东、陈宝光)、《惊沙》(小滨),根据《中国作家》刊发的纪实文学改编的电影剧本1部,在获奖26部电影中占23.08%。

在获奖33部电视剧中,由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刊发的电视文学剧本1部《辛亥革命》(王朝柱),另有两部根据《中国作家》刊发的纪实文学和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远山的红叶》(郝敬堂原著)、《湖光山色》(周大新原著),两项合计占33部电视剧的9.1%。

此后,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刊发作品多次获得各种奖项,成为我国刊发影视剧本的权威园地。

党的十九大以来,我国影视业迎来飞跃发展新时期,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也获得新的发展契机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指引下,相信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版将会见证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历史。

质队长,那时候,地矿战线英雄辈出,李四光、王进喜,无人不知。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氛围,说我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人,或者说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,我深以为然。

有了这样的情结,最想当解放军对我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可为什么明明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当范文展示,却从未想到要成为一名作家呢?很多年后,我终于明白了。这是源自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敬畏,人一旦有了敬畏之心,于自身而言,便不会轻言妄谈,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弱点吧。

可以这样说,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史诗。中华文明史中那些无数的伟大名字,在历史的星空里依然闪烁着光芒。这些人无疑是我们的英雄,无疑是我们自信的源头。有了这样的认识,就有了敬畏,有了这样的敬畏,始终不敢轻狂妄语。

几千年来,中国的作家、诗人在中华历史的伟大进程中从未缺席过,他们竖立起一座座民族的精神丰碑,传承着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。近现代的爱国作家、艺术家在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,他们没有缺失,而是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吼声,他们一手拿笔、一手持枪,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。那一个鲜活而庄严的名字,到今天依然令人肃然起敬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前夕,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。70年以来,有良知的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从未缺席伟大祖国而书写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他们热爱党、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,是我辈学习的榜样。

于我而言,中国作协历史的前50年,我不在其中,不是亲历者,只是从作家、诗人的作品中,感受到那份热烈的爱国情怀。而我在入会后的20年里,每次来到中国作协,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,常常倍感作协和党的温暖。中国作协是党联系广大作家的桥梁和纽带,我想我的感受也是大多数作家普遍的感受。

我是一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,常常怀有对先辈的敬畏之心,怀有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吹响之际,我辈应当学习先贤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坚守“四个自信”,坚定“两个维护”,以一个文化战士情怀,勇往直前,战无不胜。

1949年7月23日,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,1953年10月,改称为中国作家协会。在中国作协推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潮的号召下,1954年11月8日,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前身“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”成立,后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,1993年更名为现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。

西安市东门里与有名的“张学良公馆”相邻的一条坐东朝西的深深院落,原来是爱国将领高桂滋的公馆,将军离世后,先为中苏友协,后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之地。我知道它,是因为柯仲平、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《延河》文学编辑部。1976年,陕西作协恢复工作后,我也从东木头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迁移到这里的《延河》编辑部,当了一名文学编辑,直到2005年底退休。

在几代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的穷困家庭中,我算是一个幸运者,九岁时进入村边一个破庙改建的有三间教室的村小学上学,并顺利升级到附近的小学读五、六年级。我的班主任是一个高个子、大眼睛,能写几句白话诗的文学爱好者,他以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,很快使我爱上了阅读和作文课,并且在班级脱颖而出,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一次在他的课堂上,我突然感冒发烧,他让我躺在他以宿代办的单人床上,泡了芦根水喂我喝,在他的办公桌上,我看到了一本叫《保卫延安》的书。看我喜欢,他就给我讲军旅记者杜鹏程发奋写作的故事,并将书借给我带回家看。经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和一个星期天,到了星期一,我竟然将这本书看完了,老师很吃惊,怀疑我是否真读完了。为了证明我读完了,我就给他讲了书中主人公周大勇的故事,并将团政委李诚对他说的“一个人要保持对日常事物的敏感”的话背着他听。老师高兴地将此事讲给校长,校长又传遍全校。

到了中学,我便知道西安市建国路71号有个作家协会,作家协会出了一本杂志叫《延河》,上面经常发表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柳青、魏钢焰等人的小说和散文。初中时,我的一篇课堂作文被语文老师称赞,说这篇作文可以投给《延河》编辑部。我从作文本上将它撕下来,竟有十多页,没有大一点的信封,我就将它卷成一个卷,外边包一层白纸,写上建国路的地址。我当时不敢署真名,就写上我和一个少年伙伴两个人的乳名。在邮局柜台盖上“邮资总付”的戳子后,邮局工作人员让我投进外面的邮筒,邮筒的口太小,塞不进去,我就将稿筒压扁硬塞进去。

天天等,夜夜盼,直到暑假的一个傍晚,大队长把我叫到村中大队部门口,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,说:“你俩得是告状呢?退回来了,好好的娃不好学!”我羞愧地拿到家,看到的是一个油印的退稿笺:“不拟刊用,原稿退回,请查收。”母亲看到我偷偷藏什么纸,也以为我告什么人,一脸忧伤地劝我:“娃呀!咱穷家小舍,可不敢再惹什么事。”杜鹏程、柳青和西安建国路71号,从此就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。那是一个文学的圣地,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。

想不到的是,经过六年大学文科的学习和一年多部队农场的劳动锻炼,我竟然被分配到包括陕西省作家协会、剧协、美协、音协四个单位的刚刚恢复的“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”,并被安排到文革后复刊改名的《陕西文艺》编辑部评

论组。正是在这里,我见到了刚从陕北、陕北、关中各地落实政策,重新回到城里的胡采、柳青、王汶石、杜鹏程、李若冰、魏钢焰等星辰般的文学大家。柳青给我们讲:文学是“六十年一个单元”,要进“政治、生活、文学三个学联”,王汶石给我们讲一个党员应具备的“信仰”,杜鹏程一字一句帮我修改习作,李若冰给我们讲“作家、战士”等等,使我明白怎样做一个努力学习、刻苦钻研、奋斗不息的文学工作者。

正是在这里,在建国路71号院落中,我陆续认识了后来成为大作家并成为亲密文学朋友的陈忠实、路遥、贾平凹、叶广岑、高建群、李国平、红柯等陕西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。



□李星

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,感慨不已。退休后有有一次我去陕西省作协大院办事,从80年代初新建的三层办公楼出来,正好遇见已经成为新一代陕西文学界的佼佼者周瑛璞走进来,我在这里曾多次遇见过或来开会或来送稿的她,虽然我同她早已熟悉,但还是习惯性地招呼:“你也来了!”她一愣说:“我来上班!”我才猛然醒悟:主客已经易位,她已成为这里的一位新主人。顿时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:“玄都观中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上世纪70年代的建国路71号曾经辉煌过,从延安走来的柯仲平、柳青、胡采,又走过了从关中大地走来的陈忠实,从陕北黄土高坡走来的路遥,而50年代出生的贾平凹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席;除了贾平凹,平房变高楼,建国路71号省作协,我认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,连在这个院中玩耍长大的儿女们逢年过节,寻访我当年的“旧居”,还要被保安部门派来的门卫盘问登记。与此同时,是如周瑛璞这样的文坛新人,从这里走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坛。

## 建国路七十一号

## 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

□欧阳黔森



我加入中国作协已经有20年了,与德高望重的老会员们比算一下,我算是不老也不年轻。想起第一次参加作代会时的情景,仿佛历历在目。

那是2001年12月,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,地点是在北京丰台。大会选举了巴金继续担任主席。2006年,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,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。至今,也是三届全委,在“60后”的作家中也勉强算是“资深”吧。

从小就喜欢文学,不等于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。小时候,老师们总是引导我们,要有理想,也总是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理想。回忆下来,我回答过老师有关理想的话题中从未有“作家”这两个字,当然,想当解放军是首选,其次是当数学家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怎么也未想过,为什么当时我居然想当数学家,真是太不自量力,要知道,那时我的数学成绩太差了,经常考3.4分(要说明的是,那时已经实行100分制)。到如今,我的算术也就是个加减乘除的水平,其它一概不会。

很多年后,当我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时,想起来这段离奇的往事,仔细一梳理,心中才有了答案。原来,当年徐迟先生写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影响实在太,数学家陈景润是家喻户晓的英雄。这便是我想当数学家的理由。我从小在地

## 我心中的中国作协

□张之路



上世纪50年代,我上小学。

有一天,一个小朋友到我家来玩。我问她家里是做什么的。她说她爸爸在中国作协上班。我很奇怪地问:“做鞋?做什么鞋?”大家都笑了。小朋友告诉我:“不是做鞋,是作家协会。是许多作家聚会的地方。”

我愣了,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作家协会这个名字。

小女孩告诉我,那个叫中国作家协会的单位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。院子很大,有花有树有藤架、有回廊、有假山,最后面还有二层楼。她们经常在那里捉迷藏。我很羡慕。

我童年的印象中,中国作协是个大花园。作家就是令人敬仰的人。

60年代初期,我上中学。

我的邻居老先生(老焱若)为首都剧场设计转动舞台,带着我们几个邻居的小孩到首都剧场参观。参观的时候,有人说文联大楼(现在的中华书局)就在隔壁。文联的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在楼里。我很高兴!参观完首都剧场,我怀着好奇和疑问的心情,来到了大楼门口,想上去看看。

传达室的人问我找谁?我只好回答找作家。传达室的人笑了:“学生,这里不是看热闹的地方。这里是办公的地方。”我又说:“我知道中国作协在四楼。”传达室的人说:“知道在四楼也不能随便进呀!”我只得快快而退。

那时候的我,心里总想到作协看看,看看作家都是什么样子的。可惜没有机会。

十年动乱开始,作协、文联大楼一片混乱。及至到了动乱后期,听说中国作协搬到了沙滩北街2号《红旗》杂志社的院子里,我终于走进这个大院。

发现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个二层临时搭建的板房里,我不免有些失望。那时候的作家,头上的光环都被打翻了,但是我依然想看看从板房里走出来的作家。

一个工作人员笑着告诉我:“作家不常来。”

之后,“四人帮”被打倒了,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。

那个时候我遇到了真正的作家,我见到了严文井先生、

金近先生、马振(马萧萧)先生,还有许多作家前辈。他们都看过我的不成熟的稿子。

严文井曾经对我说:“不是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写成文章的,不但是要选,还要看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素材”。这样的话我牢记在心。金近不但给我的稿子提意见,还把稿子推荐给杂志社。马振先生曾给我回信,谈对稿件的意见。马振先生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,但他却对我们说:“迎着阳光站,把影子留在身后。”

他们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在文学创作上有所进步,在如何为人处世上也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多年前,我荣幸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

中国作协在我的心里不再是一个机关,不再是一个单位,更不是一座楼房或者一座花园。它在我的心中是一群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责任感的人的集合,他们的才华团结在一起发出了激情和光亮。他们继承,他们传播,他们感恩,他们点燃希望。他们告诉我,未来的痛苦和挫折属于你们,未来的光荣也属于你们。

今天,在这庆祝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,我要由衷地感谢中国作协。祝福中国作协健康长寿!